

「英」伊恩·麦克尤恩 周小进译
《钢琴课》
上海译文出版社

《钢琴课》中的命运与选择

□张无极

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钢琴课》，作为一部宏大而内敛的小说，讲述了个人与历史、创伤与救赎、自由意志与命运交错的故事。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麦克尤恩一贯的深刻反思和对人类情感的细腻描绘，同时也拓展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对时间、记忆和身份的探讨。《钢琴课》以其复杂的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展示了个体如何在历史巨浪中挣扎求生，如何面对创伤、做出选择，以及如何最终在不确定的命运中找到某种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罗兰·拜恩斯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他的生命旅程横跨多个历史时期和个人事件。从童年到成年，麦克尤恩通过罗兰的经历，探讨了记忆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如何被时代裹挟，甚至在无意识中被塑造。小说一开始，罗兰在寄宿学校里与钢琴老师米里亚姆·科内拉之间发生的复杂关系，成为了他一生中的决定性创伤。这段师生关系充满了性别、权力和欲望的不对等，米里亚姆通过钢琴课逐步侵入罗兰的私人领域，并在其年轻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这种创伤并没有在小说中以显性的方式展现，麦克尤恩避免了戏剧化的表现，而是通过细腻而内敛的笔触，将其逐渐渗透在罗兰的成年生活中。创伤成为了他无形中的伴侣，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情感生活、职业选择乃至整个人生轨迹。值得注意的是，麦克尤恩对创伤的处理与他早期的作品有所不同。在《赎罪》中，创伤往往以直接而戏剧性的方式展现，战争、暴力和误解成为人物之间的鸿沟。而在《钢琴课》中，创伤更加隐秘，它如同一种潜流，在人物的生活中悄然蔓延，罗兰并非一次性地面对自己的过去，而是不断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中与之碰撞。这种处理方式让人联想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理论，即创伤往往并非外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是通过记忆的重构和主体的无意识欲望被不断强化与重演。

麦克尤恩通过罗兰的婚姻生活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罗兰的妻子阿莉莎，是一位对文学和自我表达有着强烈渴望的作家。阿莉莎的选择——离开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写作梦想——不仅是对婚姻传统角色的反叛，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坚守。她的离开使得罗兰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与孤独，他不仅失去了爱人，也失去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稳定身份。阿莉莎的选择引发了麦克尤恩对当代女性角色的深刻探讨。

但麦克尤恩并没有将阿莉莎塑造成简单的叛逆者或理想化的女性，她的选择充满了复杂性。她离开家庭的行为既是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也是对责任的逃避。阿莉莎的行为引发了罗兰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审视，他在失去妻子之后，必须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重新定义作为父亲、男人乃至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认知。

罗兰的钢琴学习经历，贯穿了整部小说的象征性。钢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技能，它更是罗兰生命中的隐喻。音乐代表了他生命中最早的激情与梦想，但也是他创伤的起点。钢琴与米里亚姆的关系，使得音乐在罗兰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麦克尤恩通过音乐，探讨了艺术的双重性：艺术既可以是救赎的工具，也可以是痛苦的来源。音乐成为了罗兰人生中的象征性负担，它不仅代表着他未能实现的梦想，也象征着 he 未能逃脱的创伤。

麦克尤恩在《钢琴课》中最引人深思的是他对时间与记忆的处理。小说的结构是非线性的，罗兰的过去与现在不断交织，记忆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在《钢琴课》中，罗兰的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重构，更是对他当下行为和选择的深刻影响。麦克尤恩让我们意识到，个体无法逃脱过去的阴影，记忆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绳索，将个体紧紧束缚在时间的流动中。

正如柏格森认为，时间并非是机械化、线性的流动，而是一种持续的、不断累积的存在。记忆是这种时间绵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过去的简单复现，而是与当下紧密相连的动态过程。

总的来说，《钢琴课》是一部充满复杂情感和深刻哲思的小说。通过罗兰的故事，麦克尤恩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命运的巨浪中，个体究竟能有多少选择的自由？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明 著
二百〇〇年，五十二岁的母亲从陕西农村来到深圳打工。
九百个日夜／三份保洁工作
三十余种清洁工具／每天两万步数／零缺勤
——母亲想要为自己“扫出”一份养老钱。
梁鸿 陈年喜 黄灯 联袂推荐
这是拥有包租婆称号下，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真相，也是一位女人为跨越阶层之门，抵达母亲生命尊严的自传。 张小明 著

仿佛一株坚韧的连翘

□陆远

在晋陕大地上，连翘是最常见的花灌木之一。这种植物的生命力极其顽强，黄土高原干旱贫瘠的土壤和严冬零下几十度的低温都无法遏制它的勃勃生机。千百年来，连翘一直是物美价廉、临床应用广泛的中药材之一。

从结婚以后，上山“打连翘”就成为陕西商洛普通农妇春香贴补家用最重要的副业之一。42岁开始，她和丈夫同时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经济陷入最拮据的光景，夫妻俩通常正月就出门打工，直到腊月才回到老家。即便劳累了一整年，春香也舍不得在过年前那十几天稍事休息，而是冒着凛冽的寒风上山打连翘。怕缺钱和勤劳一样，写在像她这样贫困山区女性的基因里，挣钱是她生命里最要紧的事。在这样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中，春香活成了一株连翘：无畏艰难，顽强生长。

在2020年那个被焦虑围困的春天，52岁的春香丢掉了工作。眼见在老家找不到任何赚钱的出路，夫妇俩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辗转1500公里投奔定居深圳的女儿小满，试着找一份工作。据植物专家说，溽热的华南是我国唯一无法生长连翘的地区，春香这株在西北山区苦熬大半辈子的连翘，能够融入这座生活节奏最快、竞争最激烈的南国都市吗？她没有信心。

事实证明，连翘的适应能力比想象中的更坚韧。春香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在40多年时间里几乎不接触任何文字，她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也不大会用智能手机，膝盖因为常年高负荷劳动落下病根。就是这样一个个“百无一用”的农村女性，却凭借开朗乐观的态度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很快在深圳找到一份商场保洁的工作，如一株连翘般一寸一寸在这座钢筋水泥的丛林扎下根基。春香的女儿小满，以一个前媒体人的敏感，观察并书写了母亲的打工纪实《我的母亲做保洁》。过去几年里，这本书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代流动人口的真实生活，也呈现了年轻一代对故土与乡亲的再度回望。它既是一个女儿与母亲彼此理解、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也是一部出色的当代城市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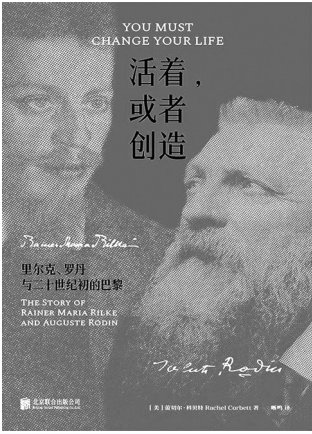
和小满一样，我们这些城市的“主人”，早已习惯于每一座商场、写字楼、公园，每一条街道乃至每一间公厕的干净整洁，却少有目光能触及在背后维系着这一切正常运作的那个庞大而卑微的人群：他们大多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普遍年龄大，学历低，工作辛苦而收入微薄。就像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说的那样，社会中似乎存在这样的情况，一种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以母亲的打工生活为窗口，小满对生活半径方圆两公里内的“附近”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和更加鲜活的体认。观察和写作就像一部探测仪，不断帮她切入那些被忽视的生活细节和具体的人：不仅有像母亲那样从农村进城顽强生存的农民工，也有粗鲁暴躁的经理、终日忙碌的公务员、不敢怀孕的白领、含饴弄孙的老人、彬彬有礼的领导……而豪华写字楼厕所隔断里传出的啜泣声和工位下越掉越多的青丝，则在光鲜亮丽的都市生活背后叙述另一重隐秘的世界。

对故乡和母女两代人成长经历的回溯，构成了本书叙事的另一条轴线。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与贫困中挣扎的苦难记忆，既相互对立又彼此纠缠，共同构筑了春香和小满的精神内核。小满已经定居深圳，春香大概也不会再回老家，作为物理空间的故园也许会荒芜，但乡土社会在几代人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终生不会泯灭，这其实也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关键所在。

在本书后记里，作者曾不无遗憾地表示，尽管自己读了不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在学术上却并无积累。在她看来，“本书如若是一个人类学作者用专业的民族志调研手法来做，可能会更加丰富多元，也更加深刻”。我倒认为，这恰恰是本书可贵的地方。近些年坊间“底层非虚构写作”渐成可观的潮流，从《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到《我的二本学生》《我教过的苦孩子》，都在用一种大多数普通读者（乃至春香这样的半文盲）都能读懂的文字，不仅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小人物发声，也关注这些人群背后公共性与结构性社会问题。城市化、权力与规训、过度劳动、性别问题、代际问题……这些学术名词写在社会科学的高头讲章中，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我的母亲做保洁》和它的同类著作，却在引起共鸣和共情的同时，与读者携手进入更深刻的思想世界。就像张小满说的，她书写母亲的打工生涯，并不想引发过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读者既能多关心“他者”，也能多关照自身，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进行选择，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是否足够努力”而决定。

我思我在



「美」蕾切尔·科贝特著 嘶鸣译
《活着，或者创造》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理想的艺术家最好孤身一人

□思郁

在文学艺术史上，有各式各样的大师与门徒，比如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弗洛伊德与荣格、中国的孔子与颜回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师徒关系让人好奇，比如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与法国雕塑家罗丹。美国记者蕾切尔·科贝特写了本书叫《活着，或者创造：里尔克、罗丹与二十世纪初的巴黎》，这是我近期读过最打动人的床头书了。

相对于那些处于“影响的焦虑”之下的门徒与大师，里尔克与罗丹看起来有点没有关系。他们不是同行，一个以诗歌为生，一个以雕塑为业；年龄相差巨大，相遇时，里尔克二十出头，罗丹年过六十；职业境遇上天差地别，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文坛新人，梦想着成为一名诗人，一个是功成名就的雕塑大师。乍看起来，这两人根本不可能有交集，但机缘巧合，里尔克的妻子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也是一位雕塑家，曾经去罗丹开设的学院学习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受到了罗丹的赏识。

里尔克与韦斯特霍夫两人1901年结婚，次年女儿出生。对于一个未成名的诗人和艺术家组成的家庭而言，他们维持生活变得很困难。里尔克出版的诗集无法挣钱养家，他想做艺术评论员，也被多家报社拒绝。他的父亲建议他改行，做个银行职员，先顾着生活再说。他严词拒绝，认为追求艺术是他一生的天职，这也是里尔克终生的艺术追求，他的一生都靠贵族的各种赞助维持生活，而他以写献诗作为回报——他宁可一家人挨饿，也不可能去做银行职员。

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时候有家出版社找到他，委托他写一本关于艺术家罗丹的著作，虽然钱不多，但总算可以解燃眉之急。同时韦斯特霍夫也给罗丹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丈夫上门。就这样，1902年的8月，里尔克来到了巴黎。

对于巴黎，我们看到过各种描述，都没有科贝特笔下的二十世纪初的巴黎让人印象深刻。里尔克初到巴黎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的人都在为了生存挣扎，没有人在乎一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里尔克在巴黎的早期受到了罗丹热情的接待。他景仰这位大师，希望能以他为榜样，他说，他并不是来写论著，而是想来求教该过何种人生。

他近距离观察罗丹的创作，也不可避免涉入到他的生活。他看到了罗丹对艺术的坚持，为了这种坚持，牺牲一切都不可惜，家庭、爱人、缪斯、婚姻。理想的艺术家最好孤身一人，“不过，或许可以有一个妻子，因为，男人需要一个女人。”艺术家的背后都有许多看不见的女性。

他看到了罗丹的创作并不需要等待灵感的来临，艺术家只需要“工作，要一直工作”，工作意味着不用等待，立即投入生命，“工作可以活下去，而不是死去”。

他学会了用艺术家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和动物，罗丹建议他经常去动物园观察动物的形体。正是从这里，他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诗歌之一《豹》，这首如雕塑般构思考究的作品，就像艾略特和庞德的作品一样具有革命性。

与此同时，他开始跟一位十几岁的奥地利军校的学生通信，接下来的五年之间，来往了二十多封信。这些信件在1929年以《给青年诗人的信》为题出版，成为了里尔克的代表作，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书。在这些信中，里尔克第一次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让你写作，你会死吗？他的回答铿锵有力，如果你觉得必须写作，“那就要依据这种必要性来建构你的人生”，其他任何人生选择都为它作出牺牲和让步。里尔克从罗丹身上受到了艺术的感召，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

里尔克完成了《罗丹论》，这只是一个开始。1905年，罗丹又聘请他当了秘书，负责处理日常的通信，每月200法郎，提供住所。里尔克重新进入了罗丹的社交圈，并开始追随他的精神导师。他变得日益强大，有声望，直到有天罗丹发现里尔克没经过他的同意，擅自用罗丹的口吻回复信件。他勃然大怒，辞退了里尔克。

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我们经常看到师徒反目，互相背叛的事例，里尔克与罗丹也不例外。寂寂无名的诗人来寻求大师的教诲，大师的反复无常最会给自己的门徒留下阴影，多年后，当诗人的威望攀升，他已经无法忍受大师的絮叨和反复无常。正如科贝特所言，里尔克在罗丹晚年疏远了他，主要是因为他不爱了罗丹的颓然老去，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受到种种世俗事务困扰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里尔克与其说是背叛了罗丹的教诲，倒不如说把罗丹的信条“工作，要一直工作”贯彻到死亡的那一刻。